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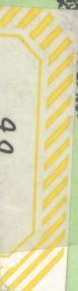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李大钊

金风

编写

新华出版社



李大钊 - 传记
K825.4 / 66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李大钊

金 风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32,000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5011-0713-0/K-95 定价：0.95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张传秀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李 大 钊

金 风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32,000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5011—0713—0/K·95 定价：0.95 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李大钊

金 风 编写

目 录

一、勤奋学习的热血青年	(1)
二、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	(8)
三、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5)
四、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史人	(25)
五、北方革命斗争的领导者	(33)
六、坚贞不屈的革命先烈	(42)

一、勤奋学习的热血青年

家 世

冀东平原乐亭县的东端，有一个村庄，叫大黑坨村。它前临浪涛澎湃的渤海湾，背依蜿蜒起伏的滦河水。晴日，站在村口向北眺望，可以隐约看到观海胜地碣石山，群峰之中，山势险峻，景色奇丽的五峰山更是古今闻名。这片风光锦绣、土壤肥沃的土地，这片哺育了千百万勤劳勇敢的人民的土地，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故乡。

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李大钊诞生于大黑坨村。他的父亲叫李任荣，是一个质朴老实的读书人，待人彬彬有礼、谦逊和蔼，但身体不好，早年得过肺病。1888年6月，乐亭县发生大地震，人畜伤亡严重。李任荣操劳过度，吐血不止，于1889年3月去世，年仅23岁。这时李任荣的妻子周氏已经怀孕，6个月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的母亲是个孝敬公婆、知情达理的贤惠妇女，丈夫的亡故使她精神上蒙受巨大的创伤，终于忧虑成疾，在生下李大钊不久，即1890年初也因病故去。

李大钊的童年是不幸的，襁褓中丧失父母，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与他相依为命的只有年已60多岁的祖父李如珍。李如珍也曾是个读书人，后来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

带开过杂货铺，在家乡置办了数十亩薄田。因为李如珍没有儿子，就把侄子李任荣，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子。他在垂老之年痛失儿子、儿媳后，便把有生之年的心血全部倾注在唯一的后代李大钊身上。

李如珍为人正直、识多见广、热心村里的公共事务，很受乡民的尊敬。他对李大钊虽然视若掌上明珠，但绝不溺爱，无论生活和学习都严加管教。在祖父的督促下，李大钊4岁起就开始认字。祖父怕李大钊光会读不会写、不明字义，就把课本上的字写在二寸见方的硬纸片上，教李大钊一个字一个字的辨读、默写。他要求李大钊读书时做到三到：一要眼到，一笔一划不要看错；二要口到，一定要念准，读音不能含糊；三要心到，听讲要专心，学了就要记牢，并要弄清字的含义。李大钊写字时，祖父总是站在旁边，告诉他端身正坐，手眼合一，精神集中，有时还亲自示范。在祖父的教育下，李大钊从小就养成了认真读书的好习惯。

刻苦求知

李大钊正式入学是从7岁开始的。大黑坨村的西头有一个姓谷的人家办了一个私塾，教书的老师是单子鳌先生。这是李大钊的第一位老师。祖父李如珍把李大钊送到私塾，单先生给李大钊起的名字叫“李耆年，字寿昌”。在私塾里，李大钊年龄最小，但他曾受到祖父的启蒙教育，很快就能和较大的孩子一起看同样的书了。李大钊热爱学习，每天都要把老师讲的功课按照要求做到会背、会写、会讲。放学后，同

学们都回家了，可他还一个人在自己的位子上看书写字，常常要单先生多次催促，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不久，李大钊的学习成绩在私塾里就名列前茅，深受单先生喜爱。单先生一生从教40余年，后来他对同学们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大钊。因为我喜欢他，给他起的名字叫‘李耆年，字寿昌’希望他能长寿。后来他自己改名叫‘大钊’，这个名字改得好，‘钊’就是刀的意思，大钊就是大刀，他立志要用大刀铲除人间不平之事，你们要努力读书，好好向他学习。”

三年后的一天，单先生找来了李大钊的祖父，对他说：“这孩子聪明用功，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了，还是另请高明吧！不要耽误了孩子。”

辞别了单子鳌先生，10岁的李大钊被祖父送到二里多远的小黑坨张家学馆里继续读书，从师赵辉斗先生。二年后，在赵先生的帮助下又到乐亭县城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的学馆里就读。宋家学馆聘请的是闻名全县的黄宝林先生任教师。黄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凡是能随他读书的人都感到很荣幸。因此，李大钊学习更加勤奋刻苦，很快就在学馆20多名同学中出类拔萃，深得黄先生的器重。他给李大钊的评语是：“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

1903年腊月的一天，学馆的年终考试结束了，同学们在一起议论清政府下诏变法，实行“新政”的事，黄先生看到孩子们如此关心国家大事，心中十分兴奋，就给大家讲起太平天国的故事。他讲了洪秀全造反，建立太平天国，颁布“天

朝田亩制度”，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还讲了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妇女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任官做事。善于思考的李大钊禁不住站起来对老师说：“洪秀全的这些主张不是都很好吗？为啥还说他是造反呢？”问题提得突然、尖锐，黄先生不觉一愣，想了一下，摇摇头说：“这个么……以我之见，喜欢实行新章程，违背传统习俗的就是‘造反’，而‘造反’是要招祸的呀！”李大钊听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冲口而出：“我长大了，就要效法洪秀全！”同学们被李大钊的话惊呆了，黄先生赶紧看了看窗外，连忙劝阻李大钊不要再说下去，但心里暗暗称赞李大钊是一个有志有识有为的青年。

先驱者的启示

随着李大钊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丰富，李大钊深深地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此时的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烧杀掠夺，强烈地刺激着李大钊的心灵。同时义和团运动等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也鼓舞着李大钊要改造中华的信念。

1905年，17岁的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学习。他仍然勤奋不懈地读书，课余时间很少出去游玩，常和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讨论国家的安危，阅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李大钊最感兴趣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传变法图强的文章，只要能够找到，就一遍又一遍的研读。在永平府中学这所中西合

流的学校，李大钊学习了两年。他除了受到启蒙科学知识和英语的教育外，还初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了解了戊戌变法的始末，感受到了民族灾难的深重，产生了研究政治，“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志向。

1907年上半年，80多岁的祖父李如珍去世了。李大钊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面临着失学的威胁。井家坨的宋举人看到李大钊年青有为，想笼络他，表示愿意出钱资助他继续读书。但李大钊认为宋举人做官得来的钱不干净，断然拒绝。他说：“我就是不念书，也不用他的钱！”这时李大钊早已结婚，他的妻子赵纫兰非常理解丈夫的胸怀。这个端庄贤惠、勤劳朴实的农家姑娘表示，就是节衣缩食，典当挪借也要供李大钊读书。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求知心切的李大钊不愿按部就班地读完5年制的中学，决心与几个好友去投考新的学校。

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考新生，出于立志要“研究政治”的信念，李大钊选择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以优良的成绩被录取。这所学校面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招生，规模很大，学制6年，在当时是颇有声望的高等学校。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便把这里作为重点积极进行活动。白雅雨先生就是负有同盟会的使命在这里任史地课教员的。李大钊入学后，在政治、法律、经济和英、日语等课程都得到系统学习的同时，更受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十分敬佩白雅雨老师的高尚情操和真识灼见，并渐渐地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11年10月，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爆发了。白雅雨等革命党人为了加速清政府的垮台，积极在京、津、滦州、张家口一带筹划起义。李大钊和几个同学作为白雅雨的助手也奔走于天津、滦州之间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白雅雨有时还派李大钊单独到家乡乐亭县联络冀东地区的农民武装。

第二年1月，白雅雨等在滦州举行起义，成立了滦州军政府。由于叛徒出卖，起义被镇压，白雅雨等人被捕入狱。在法庭上，白雅雨英勇不屈，义正辞严地宣传革命主张。行刑时，刽子手强迫他跪下，他愤怒地斥责敌人说：“要杀就杀，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然后高声吟唱绝命诗，从容就义。白雅雨老师大义凛然，舍身取义的壮烈行为深深地激励了李大钊。他以先驱者为榜样，进一步振奋了革命的意志。

仇恨的种子

1912年底，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成立了北洋法政学会。1913年4月，李大钊担任了学会编辑部的部长。经过李大钊和同事们的多方努力，第二年4月1日出版了《言治》创刊号。在这期刊物上，李大钊发表了《大哀篇》等4篇文章、两首诗和一篇译稿。在文章中，李大钊指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赶走了皇帝，建立了“共和”，但军阀官僚当政却仍然是“以暴易暴”、“敲吾骨吸吾髓”的反动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事实正是这样，中华民国成立后，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倒行逆施，并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勾结，向革命党人举起了屠刀。为此，孙中山领导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没有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很快失败了。虚假“共和”的残暴，使李大钊立志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决定到日本去学习一段时间，开阔眼界，探索革命真理。

1913年夏天，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6年的李大钊毕业了。9月初，李大钊返乡探亲，并做些留学日本前的准备。在昌黎站下火车后，他和几位同学登上了五峰山，向祖国美好的山河暂时告别。

这时，发生在昌黎车站的一件惨案，象钢刀一样刺痛了李大钊的心。9月11日晚，中国的铁路巡警杨相秋正在站内值勤，忽然发现驻扎在昌黎车站的日本兵正在抢一个小贩筐内的水果，小贩含着眼泪捂住筐子。杨相秋怕小贩挨打吃亏，就赶紧将小贩劝开。但日本兵认为这个巡警袒护小贩，就用枪托殴打杨相秋。杨相秋急忙吹笛求援，并跑回警察局。日本驻屯军在队长佐野哲太郎的率领下把警察局包围，残忍地杀死了5名中国警察。事后，又用武力胁迫昌黎县知事王芝田在歪曲事实真象的文稿上签字。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全国各界纷纷起来表示抗议。李大钊闻讯后，义愤难平，立即和朋友一起到昌黎城北的地藏寺，向停尸那里的死难者致哀。回来后，李大钊怀着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愤然写道：“自是昌黎

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亡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二、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

东瀛求索

1914年1月，李大钊得到友人的资助，满怀一腔悲愤登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船过黄海时，李大钊走上甲板，凭栏瞭望着那一碧万顷，落日狂涛，心潮起伏激荡。他追念着中日甲午海战时我国水师的殉国亡灵，更铭记着不久前五峰山下中国同胞洒下的鲜血。

到东京后，李大钊住在早稻田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内。一天，为了考察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李大钊到九段公园附近的军事陈列馆(日本叫“游就馆”)参观，看到里面摆着许多日本帝国主义从我国掠夺去的物品。这些物品是被当作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展览的。睹物伤怀，一种民族屈辱感涌上李大钊的心头，热泪从他的面颊上慢慢地淌下来。怒火在李大钊的心中燃烧，他真想把这陈列馆砸个粉碎，但不行啊，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国土，他只能把脸背转过去，面对墙壁抽泣吞声。李大钊醒悟到，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挽狂澜于既倒”，我国人民必须“痛自振励”，发奋图强。

经过一段时间补习英语等准备后，李大钊考入了早稻田

大学政治本科。把学习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李大钊充分利用早稻田大学的条件，废寝忘食，刻苦攻读。他不但认真学习学校规定的20多门必修课，而且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报纸、杂志、书籍，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思想的养分，日益坚定了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

在早稻田大学讲经济学的教授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早在1901年5月，他就和片山潜、幸德秋水等创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安部矶雄曾给李大钊讲授过“都市问题”和“特别讲义(社会政策)”等。李大钊一方面从安部老师那里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广泛涉猎西方各种民主、自由学说，将各种学说加以比较研究，融汇消化，为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誓雪国耻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了战争漩涡，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机会，加紧了对中国的吞食。1915年1月15日，日本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接受。为了换取日本对其恢复帝制的支持，袁世凯决心卖身投靠，随即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这个消息传开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一致反对。我国的留日学生更是怒不可遏，迅速召开了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反对订立卖国条约。会上，公推李大钊为文牒干事。受留日学生总会的委

托，李大钊用了几昼夜的时间，写出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油印后寄回国内，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

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不断向我国东北、山东、天津一带增加兵力，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48小时内答复。袁世凯为了早日登上皇帝宝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胁迫下，竟于5月9日全部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了，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中很快形成一股讨袁反日的爱国热潮，一致议定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6月间，李大钊在日本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发表了名为《国民之薪胆》的文章。文章历诉了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揭露了侵吞我国的“二十一条”的内容，号召国民发扬“卧薪尝胆”的精神，“磨炼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志气，誓死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还和志同道合的友人组织了“中华学会”，后与林伯渠领导的“乙卯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成为留日学生中著名的爱国团体。李大钊和林伯渠也在斗争中成为最好的朋友。

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公然宣布推翻民国，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中华帝国皇帝”。12月25日，云南蔡锷护国军起义讨袁，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民众的响应。随着讨袁护国战争的节节胜利，李大钊急于回国参加火热的反袁斗争。1916年春，李大钊到江户送友人回国。怀着在风雨中战斗的心情，“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诗句表达了李大钊对反袁斗争、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5月，李大钊怀着“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的信念，毅然中断学业回到上海，结束了他三年的留日生活。

《青春》的呼唤

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郁闷而死，然后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当了总理，中华民国算是勉强维持下来了。但各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争斗、人民大众所受的熬煎却依然继续着。

6月的一天，李大钊从上海乘船北上，到北京办报纸。临行前的那天傍晚，他和一位朋友在黄浦江边散步。当走到一座铜塑像前的长椅时，他们便坐下来想休息片刻。这座铜像是为一个在太平天国时帮助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的英国侵略者戈登塑的。李大钊和那位朋友在长椅上还没坐稳，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英国雇佣警察的喝斥声：“不许你们在这里，赶快滚开！”李大钊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问他“这是哪一国的领土！”那个警察野蛮地吼叫起来：“你们不服从，就带到巡捕房去。”由于船就要开了，没有时间应付这警察的纠缠，他们只得离开。当时李大钊愤怒地指着戈登像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把这东西拆掉！”

到北京之后，经过两个月的辛苦筹备，李大钊任主编的《晨钟报》于8月15日创刊了。报纸之所以取名“晨钟”，是李大钊要“高撞自由之钟”，以唤起民众去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文章号召全国民众，首先是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为此，他在报头印一古钟图案，每天刊登一条警句。“铁肩担道义”是最为李大钊所喜爱的一句名言，作为警句被刊登在《晨钟报》第六号上。后来李大钊曾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送给友人。

9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发表了在日本期间写的《青春》一文。《新青年》杂志是1915年9月创办的，随着它的影响不断扩大，我国掀起了一个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着封建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展开了猛烈的冲击。《青春》一文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初期就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在《青春》中，李大钊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阐明了他对宇宙、人生、国家和民族的看法，论证了“青春中华”再生的必然性。他指出：当时的中国，已是“白首之国家”，不应使其再苟延残喘，而应“一火而推焚之”；号召青年们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篇文章思想清新，气势磅礴，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给在茫茫黑夜中探索的青年以巨大的鼓舞。

李大钊在主编《晨钟报》期间，他所写的比较激烈的文章触动了实际把持《晨钟报》的汤化龙等人。由于他们的插手，李大钊很难自主地发表言论。但李大钊宁肯失业，也绝不向旧势力屈服，毅然辞去了主编的职务。不久，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担任了《甲寅》日刊的编辑。到《甲寅》之后，他在几个月内就发表了60多篇文章，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旧势力、旧思想。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李大钊逐步成长为一名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红楼的灯火

1918年1月，经友人介绍，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前北大的文、理科和图书馆等都在原京师大学堂本部马神庙。这年8月，即北京大学建校二十周年时，在沙滩建成了有200多个房间的4层工字形红砖楼。这就是现在座落在东城五四大街路北著名的北大红楼。当时的北大是新思想、新文化孕育、成长和传播的园地。由于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被聘任为教授，如以主编《新青年》而闻名的陈独秀就出任了文科学长。

李大钊到馆主持工作前，这个图书馆只能算是一个藏书楼，里面堆着布满灰尘的线装书，很少有人借阅。看到这种情况，李大钊决心把图书馆办成宣传新文化的阵地和团结教育青年的课堂。10月，图书馆迁入沙滩红楼新址，占据了红楼